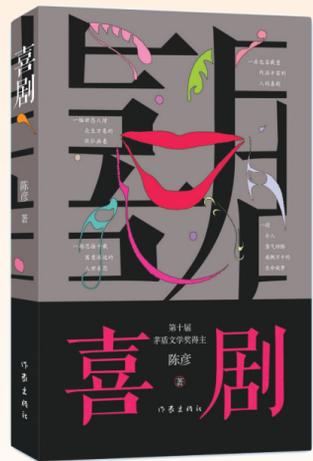


一部以喜剧演绎人生的精品力作

——读陈彦《喜剧》有感

名人与书



真是惊叹陈彦旺盛的创造力和定力,去年根据其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又相继在北京卫视等地方台热播。再闻张艺谋要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主角》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人心惶惶,他却将一部多年前写了一部分的工程创作成又一部长篇小说《喜剧》出版问世了。

看完《喜剧》,真为陈彦点赞!其一,以逼真犀利的笔法写出人性的优点、弱点和缺点,写出转型时期人被金钱、美色所异化。书中的贺加贝可谓不肖之子,他生长在喜剧之家,其父是著名喜剧演员,他从小跟着父亲贺天学做喜剧演员,但未学到真谛,也没有继承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一味追求笑点,怎样赚钱怎样编,不惜丧失艺德,追求低级趣味,殆成恶和丑的化身。在他身上,不难看出金钱和贪欲对人的异化。人如其名,贺加贝财迷心窍,钻进钱眼,老想加贝,在金钱和贪欲面前失去节操艺德,失去尊严,失去人性,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甚或罪有应得,可谓悲剧,令人痛惜,发人深思。书中,作者借亚圣孟子语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谓喜剧悲剧本质,思来想去,不过尔耳。做人且不够格,还妄谈什么喜剧悲剧?只能沦为闹剧!

其二,以戏剧手法写喜剧人生和悲剧人生,全书情节跌宕起伏,不断用“包袱”,制造看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如书前题记所言: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当喜剧开演时,悲剧就诡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它随时都会冲上台,把正火爆的戏剧场面搞得哭笑不得,甚至会提起你的双脚,一阵倒拖,弄得惨象横生。我们不可能永远演喜剧,也不可能永远演悲剧,它甚至时常处在一种急速转换中,这就是生活与生命的常态。贺加贝和其父贺天、其弟贺火炬一度就像其父艺名“火烧天”红火得了不得,夜以继日赶场子演出喜剧,不料,其父由于劳累过度,忽得口腔癌,全家一度陷入困境,虽其父抱病强打精神继续演出,不久终在死神面前坦然倒下。贺加贝和弟弟贺火炬继承父亲遗志,经过一番努力,渐渐走出低谷,进而渐入演艺生涯高潮。贺加贝同时和潘银莲结婚生子,家庭幸

福,但他被成功冲昏头脑,贪得无厌,不惜丧失艺德,追求低级趣味,滑入艺术末路。同时,因心里有所郁结而对女主角王大莲难以忘怀,也在“喜剧”之邪路上愈行愈远,终于误入歧途难以自拔,殆至家破人亡。而贺火炬不满贺加贝的一意孤行而与其兄分道扬镳,经过学习深造,请教名师,终于走出一条为艺之道,拯救了曾经以丑为美、以劣逐良、戏说历史和现实一度沦落的喜剧。陈彦之所以在题记最后写道: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不仅是以防有的原型人物找事,也反映出所写人物是“真的人物”。戏台之上的表演多有伪饰,戏台之下的人生更为真实。面对现实,观察病象,找出病根,是为了疗救。《喜剧》,堪称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世情书。

其三,书中巧妙地将《西京故事》《装台》《主角》角色串起来,使其“戏曲三部曲”以及《西京故事》得以首尾照应,完美收官。例如,潘银莲询问侄儿潘上凤学有余啥?答曰:“装台。”“装台?”潘银莲是懂得装台的,就是给演戏布置舞台演出场景。每晚演出,只要换戏,换节目内容,就要重新搭建布置新的舞台样式,那就叫装台,潘上凤怎么跟装台扯到一起了呢?她问:“你装的啥台?”潘上凤说:“跟刁顺子一起,给剧团装台。”将装台和刁顺子有机地融进作品中。再比如,写到潘银莲“他哥走的那天晚上,潘银莲还给他唱了好几板‘苦情戏’,听得他抓耳挠腮的,直说妹子唱得好。还说有几句耍赖的戏,唱的快跟名角忆秦娥比上了。见哥这样,她也感到很

欣慰。如此自然而然地将《主角》中的忆秦娥再现给读者,令人拍案称奇。又比如通过潘银莲的哥潘五福之口说道:我们邻县塔云山那边,有一个叫罗天福的,厉害得很。他把一儿一女都盘成器了,两个都来省城上大学了,并且跟上风是一个学校。这不就《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吗?如此就将他所写的小说尤其是“戏曲三部曲”的主要人物有机联系起来,给人思接广袤的戏剧世界并神游其中的美妙感觉。

其四,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喜剧》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语言极有特色,将陕西方言或古代雅语或网络语言化用,使人物的音容笑貌或思想活动或嬉笑怒骂跃然纸上,读起来十分过瘾解馋。书中提到的“黑天鹅”“灰犀牛”“蝴蝶效应”就是网络流行语,陈彦引用或化用到书中,既生动形象,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装台》到《主角》,陈彦不断淬炼语言艺术,尤其是人物对话充分体现了其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

在此,我觉得联系陈彦的创作实践,顺便说说创造力和定力。正如本文开头所写,我十分惊奇他的创造力和定力,过去我写过记述陈彦在陕西戏曲研究院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晨练时背诵中华传统经典,打下坚实的童子功的文章,仅有此不足道也。陈彦难能可贵的是扎实的生活基础,他在所写题材的领域工作生活数十年,在创作《迟开的玫瑰》(入选建党百年进京文艺汇演节目《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的同时,从将写《西京故事》时积累的丰富素材再创作出同名长篇小说之后,进一步深掘戏剧世界的深井,相继创作出《装台》《主角》和《喜剧》《戏曲三部曲》,从台下到台上,从主角到配角,从女旦到男丑,创造出刁顺子、忆秦娥、贺少天、贺加贝、贺火炬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正是长期优秀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静下心来沉下身子不断学习日积月累的生活积淀,使陈彦具有源源不断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创造出的一部又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提供新鲜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同时,陈彦社会活动及各种干扰可谓多矣,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竭力排除干扰,潜心创作。他曾说过,一个作家每年不读一百本书就会思维枯竭或知识断流。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他不为疫情所困,将十几年前“写写停停,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每个人都被迫禁足在一定范围内,我才翻检出来,又开始断裂了十几年的茬口衔接。”这种定力,没有非凡的自律和意志力是不能产生的。如果贺加贝有陈彦这种创造力和定力,就不会从喜剧演员沦为悲剧人物。 □王新民



夜色下的三联韬奋书店。



生活书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

三联书店·忆往昔九十年风雨出版路

1932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陶尔斐斯路48弄弄口一栋民居的门前,多出了一块不太显眼的铭牌——生活书店。这是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的出版机构,正式名称是生活出版合作社。邹韬奋说,要“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之后他再次强调“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了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它们和生活书店同属三联书店前身,创立之初均有鲜明的红色出版印记。

周有光曾说:“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界的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什么特殊的地位呢?就是它站在时代的前面,推进国家往前走,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工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三店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2002年加入中国出版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三联书店都投身时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已经以优良的历史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一卷书雄百万兵。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备受毛泽东青睐,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导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党史学者金冲及说:“今年是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包括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忠实读者已经76年了。我最早读到这三家书店的书大概是1946年,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于1938年战火纷飞的上海。在遇到刚刚成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前,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年轻人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翻译《资本论》,但没有出版商敢出版。1938年,上海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在政治形势严峻险恶,经济又极困难的条件下,读书生活出版社毅然出手,采取边翻译、边付排的方法,全力推动《资本论》的出版。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首次以中文全本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四百余种红色读物中,除了解放区出版的部分外,其余二百多种均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这三家出版社出版。

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

年5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三联书店的人文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这一时期尚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三联书店,一方面利用在文化人中广泛的人脉,出版“大作家的作品”,推出了风行社会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包括夏衍、聂绀弩、唐庚、柯灵、廖沫沙等人的杂文集)作品。另一方面,则译介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优秀文化读物,畅销一时的《情爱论》《欧洲文化的起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等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

1981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是当时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图书。这是一本重拾文化和知识尊严的书,是对历经劫难而不失气节的读书人形象最有力、也最有情的文字记录。随着《傅雷家书》的出版,三联书店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大作家的作品”,广受读者喜爱。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一批新的中青年著译者为三联带来了两套重要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崛起,在80年代曾经引领思潮的书籍出版活动,在九十年代展现出鲜明的商业竞争特性,整个社会阅读风向也发生转变——更为多元,进入读图时代。1995年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的热销也加速了《陈寅恪集》的问世。

2003年,杨绛回忆录《我们仨》出版。作者笔下的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一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打动了千万读者。这一期间,三联还出版了《城记》《上学记》《八十年代访谈录》《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重启改革议程》《邓小平时代》“王鼎钧作品系列”“滇西抗战三部曲”“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北岛集”等一系列优质畅销作品。 □春月

隐喻的疼痛,在劲吹的大风中愈发清晰

——读紫藤晴儿诗集《大风劲吹》

诺瓦利斯曾言:“因为生命本无意义,但是又必须得延续下去,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所以人们在精神中构造,或者爽快地说,虚构出一个借以安生的体系,或者说,虚构出一个‘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诗人紫藤晴儿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虚构”一个“家”,并以隐喻的方式呈现。

荠菜在寂寞地生长
我在空旷的大地上想念我的父亲——
《荠菜》

这里的“父亲”已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一个隐喻。因为人们失去了父亲,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灵魂的庇护所。那么,想念父亲,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信仰、生活支柱或者说精神皈依。

没有什么能替代父亲在为这个世界表达什么

我的悲伤在阳光下也会被穿过
……
如果我相信这样的暖
还会有一种错觉在发声
父亲也会再向我询问什么——《衣架上的阳光》

在文学史上,父亲也是一个母题式的存在,更是每一个家庭中最可靠而又能依靠的那个人。他远不止一个伦理称谓,更是包含着多重象征意味的隐喻。所以,诗人即便面对着父亲生前用的衣架也有内质化的思考。虽然,她没有让我们看到父亲的形象,但他却无处不在。

草垛还是原来的样子
像父亲一直都在,他总会热火朝天地劳作在农具碰撞着大地的火花中
他有用不完的力气——《父亲的草垛》
在诗人看来,时间就是这草垛。当然,这里的父亲并非特指某一个体,而是一类。这个草垛便是父亲的象征,那么草垛的某些特质即为隐喻性“父亲”的某些特质。草垛,在乡村是朴素的、普通的,但又不可或缺的,默默呵护着乡村,温暖着乡村,指引着游子的返乡之路,让乡村更好地成为乡村,让故乡更是故乡。那么,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有限的肉身,却延续了生命与精神的

传承,承接了前人的精神与血脉,并把它们自觉地传承给后人。而诗人笔下的父亲,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书写、延伸。当然,这种书写,更多是形而上的。

行走,登高,父亲在左边
我在右边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使我激动
即便大自然也赐予尘世礼物
或果实——《重阳》

仔细审视,在其笔下,与其说是“父亲在”,毋宁说是不在,因为不在,“我”才去寻找才去追寻,也就是说在还乡。当然,还乡远不止回到故乡那么简单,它更是本心的历练旅程,是精神出游后的回归,一种状态的升华。而在荷尔德林的理解里,则是对于神灵的庇护的努力,是追寻“诗意的栖居”,是一种深远的人文关怀。自然,这时候,在文字的尽头审视,紫藤晴儿的诗就别具一番意味在心头了。

仿佛父亲还在,平常的日子在小院里洒上阳光
那个时候似乎我不在意冷暖
不在意节气
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霜降》
这尘世中的一切生命现象,无不充满着神秘。而你一旦深入其中,并有所深悟,那么,这个世界自会以其他情形呈现在你面前。你则将成为宇宙的对话者,那么,宇宙的语言也不再是无可破译的密码,一切神秘的东西都会得以理解。所以,在霜降来临的时候,诗人依稀发现了故乡、父亲,那么,有故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物呢?我只对故乡在意,没有了故乡,我们都会面临风雨的肆虐,灵魂的不安。

疼痛的天窗只能长出明亮的眼神
去认知这个世界
或者埋伏着苦果站立在文字的庙宇
永不低头——《这个父亲节》
海德格尔有言:“在这匮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这样的话,用在此刻的紫藤晴儿身上实

在是太恰切不过了。父亲的缺席,让我贫乏无所,只能在文字的庙宇里得以栖息,寻找庇护,希望返回故乡。我成长的村庄,然而,谁又知道。

在村庄,树木葱茏
的乡村,也是我一片乡愁
它飞向了哪里?生命之重在它的四肢,
五脏六腑中
向着天空,远方——《灰鸽子》

远方有多远?这也许不仅是诗人的迷茫,何尝不是所有人的迷茫呢?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我们自远离了大自然,每个人都是无根的、游离的,所以,自卢梭开始,“回到自然去”便成了绵延不绝的呼声。而“回”则意味着回归自然的状态,只有“在”自然中,无家可归的浪子状态才能得以克服,并觅得诗意的栖息之所。无疑,诗人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悟:

当我在电脑上打出麻雀这两个字
它们的叫声就会像一张宁静的大网
又把我的思绪局限于它的意义
我又在本能地召回
那棵树,还有那条街道,还有这个冬天的
寂寥——《麻雀》

对存在意义的探索,是人文精神的精华所在,当然,更是人类与他物相异的标志。而人类宿命不得不选择一种东西作为存在意义的探寻。紫藤晴儿选择的便是诗。但是,诗又是借何种方式存在的呢?在这里,可以发现,诗人的写作便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我在故我思”的载体。她经过灵魂的艰难跋涉,借助“父亲”的隐喻,拄着文字行吟,并借以营造了心灵的庇护所。也许,她还没有在最终极意义上得以“返乡”,但她在返乡,接近了“故乡”。所以,她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提升了自我,升华了自我,慢慢向着本源的“我”回归。所以,我相信,她终究会——
以闪光
照过冬天——《风口》 □梦阳

佳作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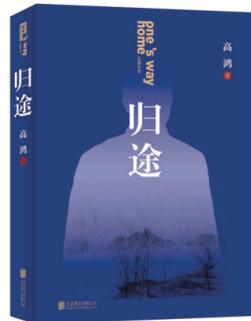
高鸿长篇小说《归途》出版发行

新书讯

本报讯(记者 刘诗萌)

近日,我省作家高鸿长篇小说《归途》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全书共42万字,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立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和人心变迁。农村青年安伟国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不重复父辈一辈子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在二哥、大哥的帮助下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工人。然而安伟国参加工作后才发现,当一名工人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最后努力学会外语,准备出国留学,却因为护照问题不得实现,无奈只能以厨师的身份去国外打工,在那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最后被人愚弄,流落街头,人生跌入谷底。面对命运的无情打击,安伟国凭借坚强意志学会了啤酒酿造工艺,回国后与朋友组建公司,成为国内高端啤酒销售之翘楚。赚钱后安伟国不忘家乡振兴,毅然返乡发展生态农业,建立啤酒工业园,带领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小说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在进城与回乡的



双重情感谱系下,用多维度的叙事与民间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再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奋发的新风貌,为读者奉献了一幅美好清新的乡土画卷。

高鸿,陕西富县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